

# 凝望抗大： 身居窑洞里，放眼看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纪念馆。

或许，世界上没有哪座高等学府比它更独特。这所大学，没有大楼——它的校舍，坐落在黄土高坡千沟万壑的褶皱里，藏身于延河之滨的一孔孔窑洞里。

这所大学的教员，没有高级职称——建校之初，仅有3名专职教员；最受欢迎的兼职教员毛泽东，是一名中等师范毕业生；第一任校长则是一名28岁的青年指挥员。

80多年前，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革命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相聚于此，“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里，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正是这样一所独一无二的“窑洞大学”，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不到10年间，抗大相继锻造出10万余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抗大，由此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座“人才高地”。

抗战时期，窑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活动的空间载体。抗大的教学工作，同样在窑洞中展开：“坐地听报告，站起来唱歌……”身居窑洞里，心怀全中国；翘首登荒山，放眼看世界。

这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窑洞大学”，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始终站在“桅杆”眺望前路的历史视野与时代气魄，带领中华民族和人民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凝望抗大，我们的视线，越过那片黄土高坡，看到更广阔的远方与未来。

##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初心，共同的奔赴

穿过店铺林立的延安宝塔区二道街，记者来到抗大纪念馆前，与一群迈着整齐步伐的年轻军人不期而遇。

这群驻足凝望的军人，来自国防大学。这所军事学府的前身，便是昔日的抗大。

研究生学员陈媛媛，仔细端详着纪念馆墙壁上一幅黑白老照片：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上，一

群青年男女步履匆匆，翻山越岭而来。

照片下，一行小字注释，标明了他们的目的地：延安。

跨越80多年的烟云，陈媛媛仿佛从这群年轻人脸上的急切表情，感受到一股热血沸腾的脉动。

时光倒回到193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要“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12月28日，毛泽东亲自给学员们作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变事的报告。

党中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为中国革命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1937年，红军大学迁到延安，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以“培养抗日救国领导人才”为办学宗旨，向所有革命青年敞开大门。

站在抗大各期学员名录的展板前，国防大学教授钱均鹏指着几个名字介绍，西安事变后，原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也奔赴延安，进入抗大学习，其中就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等。

烽火岁月，“到延安去”成为当时最时髦和自豪的时代口号。曾经，来自海内外的革命青年们，穿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纪念馆工作人员为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仅仅从1937年7月到1939年6月，延安就接纳了3万多名青年学生，一半以上进入抗大。

“我们大学的人很多，有几千人。我们的理想很大，要解放全中国。”毛泽东接见爱国青年时说，进抗大没有考试，大家从全国各地不畏艰险奔赴而来，这就是最好的考试。

穿行于纪念馆中，记者耳边不时响起《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声音：“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共同的抗日救国理想，使这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聚在这所“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高等学府。到了抗大学什么？毛泽东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

“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代表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有了党的领导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理想信念，抗大师生排除万难，自己挖窑洞、种粮食、编教材、制教具，用白土搓成细条晒干当粉笔，拿子弹壳自制蘸水笔，用敌人的传单背面作笔记……

在纪念馆里“抗大魂”雕塑前，记者和学员、游客们一起聆听了钱教授的现地教学课《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革命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抗日先辈那一代人的事。只有依靠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才能让抗大越抗越大。”钱教授说。

心向抗大，砥砺前行。年轻学员们寻根抗大，感受当年的精神磁场，初心依旧清澈质朴：为了中国更强大，为了人民军队更强大。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初心，共同的奔赴。2022年，习主席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馆时强调：“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 因信念，所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远方

与奔赴抗大时革命青年们脸上的急切表情遥相呼应，纪念馆内另外一张老照片，定格了抗大学员毕业后奔赴战场的坚毅背影。

凝望这些不知姓名的背影，武警延安支队某中队指导员李超不禁问身旁战友：“不知他们当时心情如何？是否预感到此去一别意味着什么？”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抗大奉命转移到敌后办学，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抗大分校，让学

员们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

一面面抗大校旗，插入敌人的“心脏”，一名名抗大学员像点点星火，播撒到抗日战场。秉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抗大教育方针，在百团大战中，抗大学员组织6个见习团参加战斗；反“扫荡”作战中，抗大师生配合主力部队歼敌万余人……

看到纪念馆展柜里一本旧书封面上“特种作战概要”几个字时，陈媛媛愣住了。

“这，真的在抗大纪念馆吗？”陈媛媛入学前曾是某特种作战旅的一名小队长，看到封面的一瞬间，她有点恍惚，“没想到，早在84年前，抗大就开设了我军首个‘特种兵科’”。

继续参观，陈媛媛惊奇地发现，如今部队列为日常训练课目的“爆破专业训练”“深入敌后侦察”“前期侦察”等等，都能在抗大学员的课程中找到影子。她不禁感叹：“这是多么前瞻的思维和眼光啊！”

因为信念，所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远方；因为信仰，所以坚定走向远方。

记者在这所“窑洞大学”里，寻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超前布局、学习创新的基因密码。

1937年，美国新闻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陕北端起相机，记录下这一幕：窑洞土壁上的教育挂图里，美国海军“萨拉托加”号航母，赫然在列。

此外，挂图上还有战列舰、多炮塔坦克、水上飞机……从装备图样到结构原理介绍，这些挂图几乎涵盖了20世纪前30年世界军事技术的精华。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军队也是一所大学。凝视纪念馆老照片上抗大师生求知、求胜的热切眼神，来自海军部队的学员黄嫣艳，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

从这所“窑洞大学”走出来的抗大二期毕业生刘华清，成长为共和国上将。1980年，他随代表团出访美国。第一次登上美国航母，老将军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端详的动作，被镜头定格为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

在人民军队加速转型的今天，像黄嫣艳一样年轻的海军军官们，见证并亲历了人民海军驶向深蓝，进入“三航母”时代。

“今天，我们这代人面对的无声竞争、无形比拼，烈度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战场。”黄嫣艳格外清醒，“抗大最宝贵的遗产，并非具体战术，而是那种‘为打赢明天战争而不断学习创新’的前瞻思维和内生动力。”

## 把梦想化为目标，把目标纳入规划，把规划变成现实

仔细看过抗大纪念馆展出的众多教材后，学员包恒榕发现，抗大最重要的课程是战略和哲学，这两门课都曾由毛泽东亲自讲授。

对此，国防大学副教授王增祺向记者进一步解释道：“战略，使人看得长远、全面，看清中国社会和抗日战争的全局和未来；哲学，使人看得准、看得清，能辩证地把握矛盾发展进程，掌握科学理论武器和科学工具。”

1936年底，毛泽东曾为红军大学写下教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强调：“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

身居窑洞里，中国共产党人擘画一张宏伟蓝图——

“延安处处有学校，延安遍地有歌声。”当年，为了大规模造就革命人才，共产党仅在延安及周围就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等30多所干部学校。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陆续成立了形式多样的科研机构和科技社团，让科技人员有研究和发展的平台。

在历史的大坐标系中思考，我们就能理解，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仍兴办那么多学校、科研机构，为的正是“明日之中国”。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校都与延安时期的“窑洞大学”有着直接历史渊源。

记者探访期间的一个晚上，延安一座大礼堂里战歌嘹亮。一群空军学员在此组织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唱响《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

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穿透时空，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坚定执着。支撑这一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善于把梦想化为目标，把目标纳入规划，把规划变成现实。

“强军兴军的接力棒，交到我们这代人手中，这既是如山责任，更是无上荣光。”李超说，奔向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里程碑，每名中国军人都都在加速进行接力跑，都要跑好自己的这一棒。

解放军报

# 李福林：雪冷血热，矢志抗日救亡的「哈东司令」

李福林（1907—1937），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哈东游击司令、第三军一师政治部主任。

李福林原名公道珍，又名崔东范，1907年5月21日生于朝鲜咸镜北道稳城郡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读书。11岁时，随全家迁移至中国吉林省和龙县明岩村。1920年，到县城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开始接受进步思想，参与一些革命活动。1928年春，和五名志同道合者在家里召开秘密会议时，突遭敌人逮捕。押解途中，他把警察打落水里，趁机逃跑，从此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1929年，李福林先后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到宁安县的东京城和海林、阿城县从事农民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在海沟一带做群众工作时，被敌人逮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营救救出狱。

1932年春，李福林任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珠河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在珠河地区开展难民救济工作，并进行广泛的反日宣传，建立反日会、反帝同盟等组织。同年秋，和金策在珠河县蚂蚁河东山组织了一次有一千多农民参加的反日游行示威，成为珠河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日斗争，震惊全城，但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珠河中心县委机关也被迫转移。

1933年初，根据珠河中心县委的指示，李福林组建珠河地区抗日武装。同年6月，与李启东等打义勇军孙朝阳部进行团结抗日工作，后因孙朝阳的同伙密谋要杀害这支队伍。以此为基础，正式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推选赵尚志为队长，李福林为党支部书记。不久，游击队在三股流消灭数名欺压群众的汉奸、走狗，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并枪毙了土豪王福山，受到群众的拥护。仅一个多月，游击队就发展到三十多人。

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击队改编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李福林任哈东支队党委书记。1935年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年义勇军，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福林出任第三军执行处长。同年9月，第三军扩编为六个团，李福林任第一团政治部主任。

1936年初，赵尚志率第三军主力西征，李福林率一队在延寿、方正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从军需物资和兵员等方面有力地支援了西征部队。8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李福林担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哈东游击司令。他率领一师指战员，有力地粉碎了日军的“讨伐”，保护了群众利益，极大地鼓舞了群众。9月，在珠河联席会议上，李福林当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冬，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六、八、九军联合组成的抗日联军依东办事处主任。

1937年1月，李福林率一师一团转战哈东一带，多次袭击敌人据点。袭击林口县城时，打死日军、伪警察数十人，缴获许多枪支，充实了武器装备。后又过松花江北，转战通河县的大、小古洞和二道河子等地，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励许多爱国青年报名参加参军，壮大了抗日队伍。

同年4月，李福林率少年连和警卫连一百七十多人去省委开会。因奸奸告密，在途经通河县二道河子时，被六七百日伪军包围。激战至黄昏时分，在指挥部队突围时，李福林不幸中弹，双腿被打断。战友们要背他突围，被他拒绝。他架起机枪一边掩护战友，一边迅速销毁文件。当他目送部队成功突出包围圈时，日伪军冲了上来。在敌人密集的扫射下，李福林壮烈牺牲，时年30岁。

李福林为珠河游击队的创建和抗联第三军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爱戴的“哈东司令”。通河县人民为怀念他，县人民政府在清河镇二站村北山建立李福林纪念碑。

人民网

